

“小局”顾不了“大局”的义务普九达标

□李昌平

湖北的义务普九达标建设是从1994年开始的。周沟乡是路边上的乡镇，属于全省普九达标检查验收的重点单位。全乡23个村场，按照上面规定，应该至少修建18所完全小学。分管教育的副书记传达上级指示后，拿出了修建15所完全小学的初步方案。但方案遭到了分管财经和计划生育的班子成员的置疑，置疑的理由是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周沟乡每年人口出生率为0.9%左右，每年出生人口280人左右，一个班35人，只能容纳8个班的生源。这就是说完全小学不应该超过8所。

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安排计划生育办公室尽快做出1995-2010年的1-7岁人口模型。三天后，模型出来了，从2002年开始，全乡小学一年级入学儿童将在250人以下，如果考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际每年新增生源不足220人。于是，党委政府提请乡人代会作出了“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决议。完全小学所在的村庄出土地，其他村多出民办教师，修建学校的资金和教师工资全乡按人口平均摊派。

这个民主、科学的决策，让县分管教育的县领导和教育局长恼怒万分，他们多次上门做工作，也多次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要求周沟乡严格执行15所完全小学的普九计划；县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多次单独找我“开小灶”，希望顾全大局，为县委分忧，至少要建12所完全小学。

不是我不愿意顾全“大局”，实在是“大局”不顾“小局”，导致“小局”顾不了“大局”。我实在没有办法改变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15所完全小学普九方案。

有一天，县委办公室通知周沟乡，省普九达标督办组要到周沟检查工作，指明要求我第二天在家等候，并亲自汇报普九达标工作。检查组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就到了，神秘告知“机密情报”：省检查督办组的负责同志不抽湖南湖北烟，只抽云南的玉溪王（80元/盒），要求准备两条玉溪王给检查组的组长。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有这么高档的香烟！不仅如此，“先头部队”要求我端正态度，对督办组领导的督办意见要积极表态落实，不要讲“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8所完全小学方案，只能按照“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无校不成校”的15所完全小学

的方案汇报；乡普九达标建设班子还连夜准备了书面汇报材料，并安排乡干部晚上住到沿路的各个村，和村干部、学校老师一起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省普九达标检查督办组一行20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周沟乡。那位督办的负责同志真的只抽“自己”的“玉溪王”，对“芙蓉王”香烟看都不看一眼。检查组负责人的行为激发了我的“不瞒”情绪，我丢开了准备好的假材料，如实汇报了“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8所完全小学普九方案。没有等我汇报完，省督办组负责人就开始了严厉批评，并上升到“三讲”学习不到位的高度，是不讲政治的表现。我据理力争，客气地请督办组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周沟乡的人口模型，建议全省普九达标都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防止提高指标，浪费老百姓的钱财。督办组的负责同志可能是从来没有这样和他说话，上火了，大手一挥，竟然失风度地说：我看不懂你的人口模型，只认普九达标规划和省委省府文件。他还指责周沟乡干部没有政治敏感性，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伟业认识糊涂。我也毫不妥协，并毫不客气地说：人口模型不难看懂的，我们乡的干部都看得懂的，要是您看不懂，我们计生办的干事可以帮助讲解的。

我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过了。一位县领导及时打破僵局：昌平同志，你们的8所完小设想县委没有同意，还是按照15所完小的计划执行。这位领导转过身对省督办组负责人说：

昌平同志在耍小聪明，他在探省督办组的底，如果上面不同意8所完小的方案，他们还是会按照15所完小方案落实的，请省督办组放心！

督办组走了，周沟乡坚持了8所完全小学的方案。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案，周沟乡没有负债搞义务普九达标，1996年底，我调离周沟乡的时候，乡财政账面还摆着300万元现金。而同期其他乡镇的教育普九达标负债一般都在千万元以上，绝大多数乡镇财政都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负债。

周沟乡义务普九达标，坚持了正确的方案，却付出了代价。如，修建新周沟中学没有得到上级政府一分钱支持；周沟乡好的老师，逐步调出周沟，而每年分配来周沟乡的教师，都是相对差的学校的毕业生；周沟乡主要领导被戴上“不重视教育，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等等。

《我向总理说实话》未收录的“改革故事”之四：



银行里的捐款箱

□杨飞

许多年前一幅有双大眼睛的小姑娘的照片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双充满求知欲的大眼睛。正是由于那双如水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改变了多少失学儿童的命运。后来我才知道她叫苏明娟。

曾几何时，在我们银行的柜台前也设了一个募捐箱，编号CQ153。上面写着一排醒目的字：您的一份爱心可以改变失学儿童的命运。

CQ153设立的那天，同事们曾私下议论，谁往箱内捐钱，谁就是傻子。这样的捐款，真能到那些失学儿童的手中？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宁愿一次亲自捐几大百给那些可怜的娃娃。我暗自感叹，现在的社会，少了温情，少了信任。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没有爱心，只是爱心被藏在了心底——他们怕爱心被玷污、被滥用。

每天一如既往地上自己的班，谁也没去注意CQ153，都以为不会有真正去关心它，它只是一个摆设，正如营业厅里的宣传折页架。

偶尔一日，一位同事惊奇地叫道：“你们看，募捐箱里好多钱！”我抬头，果然，CQ153里已装了半箱子的钱，硬币、纸币、壹分、贰分、壹角、贰角、伍角……最大的还有佰元的。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连感叹这世上毕竟是好人多啊。从此，我们开始关注CQ153，看着里面的钱日渐充盈，想象

着又一个失学儿童得到了救助。

又一天，一位细心的同事发出了疑问：“怎么CQ153瘪了？”大家一看，果然，前几天都快满了，怎么又回到了一半呢？肯定是被人偷了！同事跑到CQ153跟前一看，原先的那把锁不翼而飞。大伙儿一边诅咒没良心的小偷，一边打开了监控录像。一个小孩被揪了出来，放大图像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小孩儿——弱智、没有父母，跟唯一的奶奶生活，每天都会到银行来闲逛，偶尔同事们还给他些吃的，一个可怜的孩子。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大家都不去提它，心里都明白：这样的孩子，同样需要爱心的资助，只是又重新在募捐箱上加了一把锁。

到了年底，主任吩咐我和另一同事把募捐箱进行清理，然后把捐款划到专用账号上。取下募捐箱，看着里面大大小小的钞票，却蓦地发现募捐箱另一侧上的字：你给小苗浇上泉水，为了鲜花早日盛开，待到满园飘起芳香，花儿会记住你的关怀。忽然想起“大眼睛”苏明娟，想起那些可怜的失学孩子，想起那个每天来闲逛的弱智小孩，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我和同事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把CQ153里的点点爱心清理完毕，共计七百三十二元五角八分。划账的时候，我悄悄从皮夹里取出了伍拾元钱，在特种转账传票的金额栏里认真地填上：782.58。

□宗学哲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在不断走向成熟，不同行业、各个层次的薪资水平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市场定价，薪酬高低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人才直接而又客观的重要因素。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大本毕业的就比大专毕业的薪水高，名校毕业的就比普通院校毕业的薪水高，难怪北大MBA项目负责人就曾向媒体宣布该校MBA就业平均年薪达10万元。10万年薪毕竟不是小数，它意味着居有房、有车。

特别对一个走出校门的从业者而言，十万年薪是个心理关口，更是他们奋斗的目标。那么，在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源市场上，都是什么人在拿10万年薪呢？

知名院校的MBA

与前几年相比，企业动辄花几十万聘请MBA来装点门面的境况已一去不复返了，高位高薪不再是仅凭一个MBA就能换来的。但北大、清华等名校的MBA依然风光得很。这些名校MBA在求职时依然很抢手，因为这些学校的MBA教学体系相对严格。当然，名校的光环也会为MBA们增光添彩。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是一个从西方引入的概念，作为企业中的高级管理者，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要有“三高”：心理素质高、管理水平高、经营能力高。在我国，企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

由于市场各种不规范因素的制约及地区经济差异，越是大型知名企业，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是外企和发展较快的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收入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是呈金字塔形分布的，处在塔尖上的人薪酬多集中在百万左右，而处在塔底的一些小企业经理人的年薪只比普通打工者高1-2倍，10万年薪是处于塔身的多数经理人的平均收入。

“智慧”从业者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里，“朝九晚五”已不是唯一的谋生之路，有一群不用上班，在家动动笔杆，转转脑子，收发几封电子邮件，就能挣得盆满钵满的人，十万元年薪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底价。我们估计将他们叫作“智慧”从业者，作词作曲、企业策划、自由撰稿人就属于这一范畴。对于这类职业，通常意义上的“上班”已经完全不能涵盖其工作内容，他们需要的是自由的空气、新鲜的思维、大量的灵感。写一首好歌不必拿着到处推销，自有知音上门求教，每年的电视歌手大奖赛，那么多需要作品的新星，花几万元买一首好歌绝不吝啬；一个好点子有时可以救活一个企业，企业花大价钱请人支招早已不是新鲜事；自由撰稿人靠卖文为生，对一些好的写手来说，千字千元已经是再平常不过，对他们来说可谓名利双收。

拥有十万元薪并不稀奇，但没有付出也不会有所回报。一流的职业素质、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再加上高智商，十万元薪绝不是什么难题。

■财富漫谈

超市经济学

□张晓晖

既喜欢逛超市又怵头逛超市，因为结账的时候要排很长的队。这也说明多数人是喜欢逛超市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超市了。

在过去，逛商场曾是中国人不多的娱乐之一。大部分是穷逛，因为口袋里钱不多；即使口袋里有点钱，又缺乏布票之类的票证；即使有票证，市场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所以，要想买点紧俏的东西就要去外贸公司的友谊商店，或者趁出差的机会去上海，上海货曾让人们羡慕不已。那时，商场里的售货员态度都不大好，爱搭不理的，经常和顾客吵架。

改革开放以后，或者因为承包，或者因为效益奖金的缘故，百货商店售货员的态度逐渐好了，但有时候过分热情了，也让人不舒服，甜言蜜语反复推荐，弄得咱不买吧，觉得过意不去，买吧，又觉得上当，最后只好落荒而逃。就像相声里说的，“先生您买点这个吧，先生您买点那个吧，不撂下个三五十的，您不好意思出来么？”

慢慢地，超市出现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超市。之所以喜欢超市，是因为，自由，或者说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在超市里，商品触手可及，咱可以反复地观看、摩挲，反复地比较，不会因为售货员不耐烦而对咱翻白眼儿，也不会有谁不厌其烦地向咱推荐商品。咱们可以踏踏实实地慢慢看，反复挑，看牌子，看质量，留心保质期，即使已经放进购物车的东西还可以随时拿出去，直到最后下决心买了，才到结账口去排队。即使买了的东西，只要没有损坏，在一段时期内还可以退还，所以，咱可以大胆地买。

说到底，就是超市给了咱自由。给了咱怎样买的自由（有些食品、饮料还能够品尝一下），总之，中医里的望闻问切都用得上；给了咱买什么的自由，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在超市里都能找到，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咱该奔哪儿奔哪儿；也给了咱不买的自由，可以逛半天，然后空手出来，即便买了，还可以退换。

因为有了自由，人们就喜欢逛超市，享受一份休闲、散漫的状态，而逛来逛去，就把购买欲勾起来了，即使去超市的时候未必想买东西，但出来的时候很少空着手。可见，商家给顾客留下自由选择的余地，就是给自己留出获取利润的空间。

超市里不仅仅有自由，也有严格的管理。比如，不交钱把东西偷偷带出去，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不光超市职工、保安要留心防贼，超市还有监控录像。

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在超市里出售，比如比较昂贵的东西，珠宝首饰、高档服装；比较冷僻、销量不大的东西，如奖状、奖旗；有些需要特许的东西，比如止疼用的杜冷丁，即使在药店里，也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

治大国如烹小鲜，超市的经营也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之道。给生产者、消费者足够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地生产，然后供需双方在市场上自由地见面；而有些商品和服务不是企业愿意提供的，或者不是企业能够提供得了的，那就需要政府来做。比如，神六、青藏铁路、飞机导弹、三峡工程，公益性医院都要由政府来做，别人不肯做或者做不到，而企业、个人能做的，就不劳政府再做了。比如，学校就可以适当开放，政府只作监管。可咱见到的却是：给名牌大学吃偏饭，烧得煌煌学府不好好办学，非要玩儿高尔夫，招来不少白眼，动不动就关闭民工小学，弄得小孩没学上，说他公共教育没到位，行政手段又越位不算过吧。

另一个需要政府做的，是监管。现在出事儿的越来越多，工业污染的河流，愣是喝出了人命，化妆品、食品、药品坏事儿不少，连咸鸭蛋里都有了苏丹红。按说，人口的、搽脸的出了问题，就该罚他个倾家荡产，打他个永世不得翻身——重典之下，看看还有谁敢昧良心？出了这么多事儿，咱很纳闷，监管者在哪儿呢？忙活什么呢？

春秋时，晋文公问政于咎犯，咎犯答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食。”意思是分熟食不如分生食，因为分了生食，老百姓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烹饪，清炖、爆炒还是红烧，悉听尊便；而分生食又不如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养鸡、养鸭、放羊、种菜，悉听尊便。咎犯的这番高论，是很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就是最基础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作出最优选择。而让更多的人拥有自由和选择权，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建立富裕而和谐的社会，就像当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稍微给点自由，农民就能吃饱饭了。

比如，一块地，农民种什么，尊驾就别管了，更犯不上把人家已经种上的庄稼用推土机平了；尊驾要管的，一是耕地的非农占用，二是不许种罂粟。

管理者应该做的是，赋予公民充分的自由，建立和谐社会；同时给予严格的监管，建立法治社会。赚钱不是管理者的事儿。如果管理者经营出来多少财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多半是靠垄断整出来的。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能是好事儿么？

